

胡適和陳獨秀

李 霜 青

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之二

新文化運動批判

民國四年，陳獨秀創刊「新青年」，到民國六年，陳獨秀有意主張文化革命。新青年第三卷內，出現了反對舊家庭、舊道德，及反對孔子思想的言論。

陳獨秀說：

「道德之爲物，應隨社會爲變遷，隨時代爲新舊，乃進化的，而非一成不變的。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適於今之世也。」（第二號通信）

「全部十三經，不容於民主國家蓋十之八九。此物不遭焚禁，孔廟不毀，共和招牌當然掛不長久。」（第四號通信）

「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，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適於今世，乃以今之妄人，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孔道，支配今世之社會國家，將爲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。」（第六號）

吳虞說：

「儒教不革命，儒學不轉輪，吾國遂無新思想、新學說，何以造新國民？悠悠萬事，惟此爲大已。」（第四號）

新文化運動的「非禮」「非忠」「非孝」「打倒孔家店」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三年講民族主義時已加以批評。三十二年「五四」，傅斯年指出民初新文化運動對文化雖有檢討，其思想見解未免太幼稚。傅氏係新文化運動的大將之一，這是以過來人身份所作的由衷之言。可是到了民國五十六年，羅家倫還想把五四運動與新

文化運動混爲一談，他說：

「其他社會上仍不免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有種種的批評，有些是不了解一件事物的前因後果，有些是斷章取義而表現出『衛道』的熱忱太強烈了。他們以爲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要毀滅中國固有的文化，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。他們硬說是新文化運動者，主張『非孝』，主張『手打孔家店』，主張把『線裝書丟到毛廁裏』。我有證據拿出來，告訴大家：當時提倡新文化運動主要的刊物裏，從不曾提倡過『非孝』，講『非孝』只是浙江杭州經子淵先生辦的師範學校裏的一個學生施存統，在該校刊物裏發表過這麼一篇荒謬的文章，引起了當地的軒然大波。『手打孔家店』乃是四川一位老儒名叫吳虞的引以自豪的話。至於把『線裝書丟到毛廁裏』，乃是我們的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，當年鑒於科學不受注重，復古氣壓高漲，慨然有感而說的話。不過他底下還有一句，大家忘記了引用，就是『三十年之後，中國科學昌明了，再把這些書撈起來讀』。可見吳先生這種話，是有時代性的，並不是要毀滅中國文化的。吳先生是思想界的革命家，他當時補弊救偏的議論，正足以表示他的革命精神，知時而後可以論事，現在又何必諱言？」（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）

把「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」拉出來替胡適護大門，辦法雖聰明，但吳稚暉先生已曾這樣說：

「我雖隨同打過孔家店，現在正正經經研究大道理，還是請這位老黃忠出來。」（答畢修勻書）

這也可說是吳稚暉先生深悔昔日「打倒孔家店」之不當，而發出的最後見解。

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刊物中，有沒有「非孝」「手打孔家店」？請看：民國八年一月，陳獨秀在「新青年」發表的「本誌罪案答辯書」中，已是「直認不諱」了。

胡適只是在吳虞文錄序文中最後一句話說：「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——吳又陵先生」嗎？胡秋原先生是無意上當，羅家倫先生則是有意「幹師之壘」而「爲師隱過」呢？是欺天下人不讀書呢？還是自己根本不是乃師的好弟子？不然的話，胡適文存中明明曾沾沾自喜的說：

「我們打倒孔家店，及今回想，真同打死老虎，既不足居功，亦不足言罪也。」（領袖人才的來源）

胡適反孔家店的言論是斑斑可考的。試看：吳虞文錄序：他讚美吳虞是「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」的老英雄，贊同吳虞所言：「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」，當他把那些「衛道」的先人們所言「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，都是叔孫通、董仲舒、劉歆、程顥、朱熹……等人誤解孔道的結果」一概指爲是遁辭。並讚美陳獨秀所言：「漢唐以來諸儒，何以不依傍道、法、楊、墨稱之？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

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。」胡適乃作結論說：「這個道理最明顯：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，偏愛掛孔先生的招牌呢？正因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——無論是老店，是冒牌——不能不拿下來，搥碎，燒去！」

十六年，在「整理國故與打鬼」中，說：「我披肝瀝膽的奉告人們：只爲了我十分相信『爛紙堆』裏有無數無數的老鬼，能吃人、能迷人。」

十七年二月，把顧炎武、顏元、戴震、吳敬恆四個人，說爲「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」。把一〇五〇年至一六〇〇年視爲理學時期，把一六〇〇年迄今視爲反理學時期，一開頭對理學下定義，即用歪曲手段，說「理學掛著儒家的招牌，其實是禪宗、道家、道教、儒教的混合產品。其中有先天太極等等，是道教的份子；又談心說性，是佛教留下的問題；也信災異感應，是漢朝儒教的遺跡」。

十七年三月，大呼「往西去」！

十七年七月，「名教」一文中，用了極不科學的胡扯方式，來詆毀中國的正名思想，以淆亂名教。黃季剛氏乃戲將胡適提倡白話文與亂名實並爲一談，當面叫胡氏把「胡適之」改爲「哪兒去」。胡氏不答，一笑而罷。

十九年，他說：「我是研究歷史的人，在我的眼裏，一切學術思想都是史料而已。」（讀王小徐的佛法與科學）

所以，經典在胡適的眼中，只剩下形骸而喪失了義理。

胡適反理學似乎也自覺不該。他一方面說戴東原是反理學的健將，一方面又說：

「戴震的哲學，從歷史上看來，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，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——哲學的中興。」（戴東原的哲學，頁八十三）

胡適在一九二六年反駁韋爾士時還指出：

「哲學的第一階段的結果是朱子（死一二〇〇）——一派得了很高的地位。」（中國近一千年

是停滯不進步嗎？）

一九六〇年在中美學術會議演講「中國傳統與將來」時，指出中國是「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」。並說：

「第二是中國哲學的復興，到十一、二世紀已經入了成熟期，產生了理學的幾個派別，幾個運動。理學是一個有意使佛教進來以前的中國固有文化復興起來，代替中古的佛教與道教的運動。……這些中國哲學家居然能够弄出來一套非宗教性的、合理的理學思想，居然有了一套宇宙論，一套或幾套關於知識的性質和方法的理論，一套道德與政治哲學。」

可見他有點承認理學的價值了。只是語焉不詳。指出胡適並非反孔，且因此而獲得研究胡適的學術獎金的，是徐高阮先生。任卓宣、胡秋原二先生因參加中西文化論戰，也怕把胡適擠成反孔派，增加敵方的勢力。其實，引起文化論戰的就是胡適的一篇反傳統、反孔子的言論，說「東方文明無靈性」而引起的。還能說胡適不反孔嗎？



反對孔子思想言論、反對舊道德舊家庭始作俑者的北大教授陳獨秀。

胡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孔的人，由他的學生毛子水指爲是「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的不成熟見解」。這是毛子水在四十九年救國團暑期青年學術會所說的話，時胡適尚活在世間，當有所聞。

胡適的晚年反孔，指「東方文明無靈性或者很少靈性」，他的再傳弟子金耀基，指爲「除了用『氣浮於事』四個字來解說胡先生這段話的心理狀況外，是找不到其他的理由」。這是胡適的「蓋棺論定」。

從而可知，新文化運動一貫主張是「西化」「反孔」「反傳統」。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準備，那五四必也是「西化」「反孔」「反傳統」，答案則否。

說到新文化運動與共產黨的關係，我可以列表如下：

陳獨秀（發起新文化運動（民國四年）
發起共產黨（民國十年。民國八年已宣傳社會主義）

說新文化運動與共產黨根本無關，或否認新文化運動會爲共產黨開路的人，還能強詞抵賴嗎？

牟宗三先生曾指出：在新文化的狂潮中，梁漱溟先生實在不易，在新文化運動中反孔頂盛的時候，盛論（雖然是浮淺的）中西文化的時候，他獨能以贊歎孔子的姿態出現，他維護孔子的人生哲學。他根據他對於王學門下泰州學派的體悟以及他所受佛學的薰習，獨能深入孔教最內在的生命與智慧。在只是「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之傳統」的窒息與僵化下（因而令人生厭），他獨能生命化了孔子，使吾人可以與孔子的真實生命及智慧相照面，而孔子的生命與智慧亦重新活轉而披露於人間。吾人須知宋明儒學隨明亡而俱亡，已三百年於茲。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動了。典章制度風俗習慣只是孔教的歷史事業或文化事業。由此言孔教，只是外在的，與孔子的真實生命

及智慧尚隔一層。現在由梁先生之體悟，已恢復了這個接觸孔子生命與智慧之途徑。這就是他的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一書之貢獻。我們青年看了他的書，覺得孔子並不討厭，很有生命，很有理想。梁先生的書，在扭轉人心上，其力量是大的。卑陋之輩所擁護的孔子，只是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下的孔子，浮薄之輩所詬誶的孔子，只是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下的孔子，這全成差謬。

「可惜梁先生並未能再循其體悟所開之門，再繼續前進，盡精微而致廣大，卻很快地即轉而為他的鄉村建設事業，自己弄成了隔離與孤立，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於一件特殊事業中。後來他又降落而局限於一時之政治漩渦中，即民主同盟中。這是他個人的悲劇，也是宏揚孔教上之不幸。」（見「生命的學問」一書）

國父對新文化運動的批判

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新文化運動持什麼態度呢？一般人常愛引 國父在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致海外同志書

「自北京大學發生五四運動以來，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，於是蓬蓬勃勃，發抒言論，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。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，紛紛應時而出，揚葩吐艷，各極其致，社會蒙極大影響。雖以頑劣之偽政府，猶且不敢攪其鋒。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，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。」

國父這裏所言「北京大學發生五四運動」，自然是誤信傳聞之言，到民國九年夏季劉琪到了上海拜見 國父之後， 國父已知五四運動乃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所發起了。 國父在「致海外同志書」中，固然讚美新文化運動，待發現新文化運動之荒謬時， 國父便提出了嚴正的批評。

民國七年出版「孫文學說」時，即反對廢除中國文字之論說：

「夫自庖犧畫卦，以迄於今，文字遞進，逾五千年，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衆，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，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，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族，亦皆號曰同文。以文字實用之遠言，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。以文字傳佈流用言，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佈最廣，而用之者，不過二萬萬人，未曾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。」

「雖今日新學之士，間有倡廢中國文字之議，而以作者觀之，則中國文字絕不當廢也。必廢去中國文字，又何由得中國古代思想而研究之？抑自人類有

史以來，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，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。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，思所以利用之。

「彼歐美學者，於埃及、巴比倫之文字，國亡種滅，久不適於用者，猶不憚搜求破碎，復其舊觀，亦以古人之思想，足資今人學問故耳，而我中國文字詎反可廢去乎？」

民國七年在粵與胡漢民、朱執信談話中，極不贊成新文學派的人視中國固有文學為「死文學」該予打倒的說法。因而有「詩學偶談」一文說：

「中國詩之美，逾越各國，如三百篇以遠唐宋名家，有一韻數句而演為彼方數千百言而不盡者。或以格律為束縛，不知能者以是益見工巧，至於塗飾無意味，自非好詩。然如『床前明月光』之絕句，謂妙手偶得則可，惟絕非尋常人所能道也。」

由於 孫中山先生如此的關斥新文化運動份子的謬說，胡適便轉首過來譏刺國民黨人談主義。說：「主義起於問題。高談主義的人卻忽略了問題」。迄今其徒衆們，尚譏三民主義為「黨八股」，譏談三民主義者為「黨棍」。請看，三民主義是否忽略了問題呢？ 國父說：「什麼是主義呢？主義就是一種思想，一種信仰，和一種力量。」

到了民國十三年， 國父演講「民族主義第六講」時，更明白的說：「……現在受外來民族之壓迫，侵入了新文化，那些新文化的勢力，此刻橫行中國，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，便排斥舊道德，以為有了新文化，便可以不要舊道德，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，如果是好的，當然是要保存，不好的才可以放棄。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，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。」

所以， 國父便要提倡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」的固有道德，以糾正新文化運動非忠非孝的歪風。今天有一般不讀書的人，還說 國父是讚美新文化運動的，這真是無根之言，自欺欺人，貽誤青年，莫此為甚。

反孔家店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，黃季剛曾當面叫胡氏把「胡適之」改為「那兒去」，胡氏笑而不答。